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一輯

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

肯南著
徐芸書譯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第一

五十年

中華民國
中華書局

總經售處

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二二九六

譯者序

肯南此書的根本用意是從二十世紀前半美國外交的歷史求得教訓，要利用這種教訓爲美國未來對外政策建立一個正確的理论基礎。而美國未來政策的中心目標自然就是解決蘇聯問題，因此本書包括這樣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九五一年春季發表的六篇連續演講，內容是五十年來美國外交歷史的分析。分析的結論意味着可以應用在全盤的外交行動上。第二部分是一九四七年和五一年先後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的兩篇論文，內容是關於對蘇直接行動的商討。這兩篇的意見不僅根據蘇聯的現實情況，也根據外交歷史的教訓。

這裡首先要注意兩件事實。(一)本書的作者肯南雖然是近幾年民主黨執政期內被拔擢的人才，但他是國務院多年培植出來的俄國問題專家，他的外交見解是超黨派的。一九四七年以來幾年間美國政府許多積極的對蘇行動雖然都是根據他的意見，但還不能說這一期間美國的外交作風和方針完全可以代表肯南的理論。(二)這個作者雖然是職業外交家，但他絕不是有些人依據「職業外交家」這個名詞所想像的那樣淺隘。他正是一個博學深思的人物。他對於蘇聯的認識和對於美國外交歷史的見解，都是敏銳而廣濶的。而且他所討論的外交政策絕不是僅僅一些外交家或一個政府的政策，而是一個民族對世界事務的認識，是一個整個民族在國際間行動的

F265/33

方針。由此我們也就知道，無論在未來美國國家政策的形成上或美國國民思想的形成上，這本書都要占一個重要地位。

本書的主要貢獻有這樣三方面：第一是提供了一種真正嚴肅的民族自我檢討。第二是提供了外交上一種健全的現實主義。第三是提供了一套堅決而熟慮的對蘇行動的基本概念。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本有不少關於外交的檢討，但都只針對着一些近期的片斷行動。肯南則認為今日的世界危機不是美國外交上一些近期的片斷行動所決定的，而是美國關於二次大戰的整個政策的錯誤所決定的，甚或是促成二次大戰的許多遠大原因所決定的。本書的第一部分就盡力指出美國在五十年裡犯了些什麼認識上及行動上的錯誤，而終於促成二次大戰後這樣惡劣的世界局勢。這也不是忽略了任何近期的錯誤，而是更嚴重地估量眼前的危機，更無閃避地檢討一個長期間裡的整個錯誤。這可算是美國以至人類難得的一次真正嚴肅的自我檢討。這個檢討不僅含有可貴的精神，而且確包括了很多意義深長的論點。

肯南在本書裡強調重視現實，並且指摘美國外交上的「道德主義」，很足以使他被認為是一個輕視道德的「現實主義者」。但他所說的重視現實並不是屈服於現實，而是切實認識現實的情況，使一切決策以這種切實的認識為依據，不以漫然的懸想為依據。他的指摘「道德主義」也不是輕視道德，而是指摘美國往往唱了道德的高調而不能實際支持，反使高調成為製造幻覺的

有害因素。例如在亞洲方面，他指出美國幾十年間並不能支持一個維持中國完整的原则，反因為提出了這種原則，有了虛幻的勝利感覺，乃更漠視了遠東的危機。在歐洲方面，他指出美國兩次參戰時的道德口號並不盡符合美國的實際立場或動機，反使美國抱了一種優越感覺，因而縱容自己陷於戰爭的狂熱，只知道追求勝利，而不暇深顧全局的利害。這就實在是要求建立一種健全的，深含着道德精神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要求美國在全盤外交行動上更深刻地，更切實地，更嚴格地，尊重道德。

近幾年來美國的對蘇遏制政策（又譯圍堵政策）誠然與肯南的名姓是分不開的。但如果以為肯南所討論或設計的只限於遏制，並且以為遏制就是姑息或消極，那就是受了不正確解釋的影響。肯南的最後目標絕不是僅僅遏制侵略，而是催促蘇維埃極權主義消滅和一個另一樣的俄國出現。遏制侵略只是達到這最後目標的一部分手段。事實上，肯南是在一九四七年那篇論文裡已預斷了蘇維埃政權的最後運命。他真是堅決的先驅，而不是遲疑者。不過他確沒有任何輕快的議論，高昂的調子，激烈的情緒，這是他容易遭受誤會的真實原因。但他的特色也正在於有一種潛沈的思慮，遜抑的調子，克制的態度，而且照他的理論說來，這正是一個堅決的對蘇政策所必要的。例如他強調不要攔斥蘇維埃制度在長期挫折下自身蝕壞或崩潰的可能，強調即使在大戰爭中也不要受道德高調與戰爭狂熱的支配，強調對於未來俄國的期望應當是有限度的。

：都並不是對蘇聯的畏懼，姑息或消極，而是要開放更多的機會，尋求更切實際而更有道德精神的領導，並且爭取更多俄國人民的同情，以達到消滅蘇維埃極權主義的唯一目的。這正是一套堅決而熟慮的概念。這本書的全部內容可以說就是直接和間接說明這些概念。

今日的我們中國人方面也很容易認那些對蘇調子低抑的人就是姑息或消極派，尤其在中國問題上是可疑的份子。但這至少不適用於肯南。單就中國問題而論，他也是有遠見的。他在本書第一部分的第五篇裡會表明當二次大戰期間美蘇幾次會議舉行之際已深感不幸。第二篇裡更提到駐莫斯科使館多次提醒美國當局不可輕信蘇維埃政府的諾言，那應當就是指二次大戰後期他在使館任職時的事。一九四九年八月出版的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裡載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肯南以參贊擔任代辦時關於中國問題的一項警告。因為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在莫斯科與史大林會談後曾有蘇聯表示支持美國對華政策的報告，於是肯南有一件電文給華盛頓的哈里曼，作了這樣的評論：

「赫爾利大使報告中他所告訴史大林的事，當然沒有一件史大林不能真誠同意，因為言詞在俄國人所代表的事物不同於在我們所代表的事物是不待說的。史大林當然願意承認統一中國武裝部隊的原則。他知道那個統一只有在中國共產黨所能接受的原則之下才是實際上作得到的……」

「……我深信……莫斯科的確切目標是：（一）恢復……沙俄前在亞洲大陸上擁有的一切外交及領土權益。（二）統治中國在中亞與蘇境相接的各省區……。（三）對現在爲日本人統治的華北各區域取得充分控制……」

「如果因爲我們在這個關頭自然切望蘇聯的支持，加以史大林使用着對一切人有一切不同意義的言詞，並且小心地善用殷勤，於是我們對於蘇聯之可以援助或默許我們達成對華的長期目標存了不適當的信賴，那是很可悲的。」（國務院對華關係白皮書，九七頁。）

本書的譯者在這裡應當特別銘感友人吳相湘先生指示注意這一段重要材料。這項警告發出是在雅爾達會議後兩個多月，日本投降前三個多月，而對於蘇聯的對華目標和史大林的外交手段，以及美國輕信的可悲，已有這樣準確的論斷。這就不僅顯示肯南對蘇聯的深刻認識，而且表明他在中國問題上無可疵議的態度。然而肯南正因爲早有這樣的識見，所以後來對中國危機反持一種較沈靜的態度，反不傾向於斥責美國的片斷輕信，而要更深長地研究美國的錯誤。這正是他對問題的熟慮，而不是他對蘇聯的姑息或消極。這種熟慮本身就是積極性的。

這位作者的全名是喬治·伏洛斯特·肯南（George Frost Kennan），一九〇四年生於威斯康辛州米爾渥基市（Milwaukee）。他從一九二五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就入外交界，到歐洲國家服務；一九二八年起專心學習俄國語文並了解俄國民族，曾在波羅的海國家長期任職，和俄語人

民共處，並曾在柏林大學專修俄國課程。自一九三三年美蘇建立邦交，他就到莫斯科使館；一九三七年以後曾輾轉任職於捷克，德國和葡萄牙；一九四四年以公使銜參贊重回蘇聯。一九四六年初他有一篇分析蘇聯的備忘錄深受國務院重視，於是奉調回國，在軍事學院主講國際關係；第二年就負責建立並主持國務院的政策設計機構。一九五〇年八月，他請假離開國務院，入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從事外交歷史的探索並研究蘇聯問題。一九五一年秋季有這本「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出版。一九五二年五月他出使蘇聯，十月就有他被要求召回的事件。他通曉俄國，也通曉共產主義，同時還是一個更淵博的學者。他對俄國人民有不尋常的了解與同情，完全能夠依俄國人民的立場以反對蘇維埃政權。他雖然自承爲現實主義者，而他的性格與思想卻蘊藏着潛沈的道德力。我們在本書裡也很容易看出他這些質素。

本書的翻譯曾受劉崇鉉，張佛泉兩位先生的鼓勵，更得到張其珣先生的全力支持，譯者應當深致謝意。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三日

徐芸書

原序

我在任職美國外交界許多年之後，負起了承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困難期間製訂美國外交政策的一份責任。政策設計委員會——我負責建立這個機構，並在它最初幾年裡擔任主管——是國務院第一個被指派從美國國家利益整體的觀點，而非從其一部分的觀點，來研究問題的正規機構。在這個機構裡工作的人們很快就感覺到無論我們政府內外，在處理美國對外關係所依據的基本概念上，絕然缺少全盤的一致。

因為這樣感覺到缺少一種有充分說明而被廣泛接受的理論基礎，來支持我們對外關係的處理，我才想去探索最近幾十年領導我們的政治家們的那些概念。說到最後，我們被迫來應付的種種新的重大問題似乎大半都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所造成的。從國際事件演變的節奏看來，本世紀之初似乎正是研究美國外交及其與兩個暴亂的大週期之關係的一個適當起點。一端是對西班牙戰爭的結束和第一次「門戶開放」照會的發出，另一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其間經過了十五年。用我們關於國際生活中大問題的因果關係的知識來判斷，這乃是一段可重視的時間，也是以當時美國那樣強大國家的勢力，如果不斷地並有決心地使用，很可以大大影響世界事務之進程的一段時間。同樣的道理也顯然適用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一個時期。一九〇

○年我們普遍注意到我們的勢力有廣及世界的重要性，而我們也可以受極遙遠的事件的影響；從那個時候以來我們的利害即不斷與這樣的事件發生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的政治家們在努力解決這些新問題時受了些什麼概念的鼓動？他們關於我們國家外交政策上的基本目標曾作了些什麼假定？他們感覺他們所努力去完成的是什麼？而在回顧中看來，那些概念又是不是適當的和有效的概念？它們是否反映某種較深刻的對於美國外交與世界環境的關係的了解——那是我們也許已經遺忘掉的，而又應當使之復活起來，作為我們的行為之基礎的東西？或者它們竟始終是不充分的，而且很浮淺的？

就是這些問題使我對於過去半世紀美國外交活動的歷史，一部由於許多私人回憶錄及報告的不斷出現與美國學者在研究及分析這些材料上的卓絕努力而大為豐富起來的歷史，有了探索的興趣。而以一個外交史方面的生手，我不能希望對這種研究工作有什麼貢獻，甚且不能希望廣博地考察這些題目上所有已出現的次要材料。因此這本書裡的幾篇演講所表現的，只是嘗試把所謂一個平常人對於主要已發表資料的知識——由上面說過的探索的興趣鼓勵着——應用在眼前種種問題上，並指示出自然應有的一些解答。

兩項有些矛盾的見解使這個研究從我自己的觀點看來更具有特殊的興趣。第一項見解就是承認自美西戰爭時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美國外交政策的籌劃確曾吸收了許多傑出的美

國人的精力和貢獻——那些人都有不尋常的智慧與教養，並以性格的完滿與經驗的豐富而深受尊敬。以某些事例說，他們實在是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物。如果他們對於對外關係的哲學的認識是不夠的，那麼美國在對於自己和其餘世界的關係的了解上，以及對於他在塑造這種關係中的利害的了解上的缺點，乃是深植在民族的意識中的，而要有所矯正是確實不容易的。

與這一層搭配着，我們卻又另看到一件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安全，或者我們思想中的我們的安全，在這半世紀的過程中遭受了可驚的損壞。在一九〇〇年絕沒想到它的繁榮與生活方式可以為國外世界所威脅的一個國家，在一九五〇年卻到了這樣一天，似乎除這個危險之外更想不到一點別的。

對這件事實的解释是什麼？其中有幾成是美國外交的錯誤？就其確是美國外交的錯誤說，錯在什麼地方——在概念上還是在執行上？就其也許是我們勢力所不能及的事物的結果說，這些事物是什麼，它們又預示些什麼？它們是否可醫治，它們又將把我們帶到什麼境地去？在這六個演講裡絕不能希望透澈解答這些問題，即使一個人覺得他已有了解答。因此這本書裡的演講只是嘗試藉這些問題的啓發來討論些個別的插曲和情勢，希望這種印象主義的方法比任何直接表達的嘗試更能夠達出我自己對於眼前材料的感應。只有最後一個演講有一點概論的意圖。我確知道這些演講在詳細的事實上是受不起有經驗的外交史學者嚴格評判的。這些演講所指出來

的結論更是當然要廣泛遭受責難的。如果它們能夠激起關於這些問題的更進一步的思想，並激起更明智，更有學識的人更有價值的努力，它們的目的就已經達到。

在芝加哥大學發表的幾次演講，包括着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且歷過這次大戰的美國外交，並沒有直接涉及今日這樣深深擾動了輿論的美蘇關係問題。爲着這個理由，也許不是每個人都容易看出這些演講與當前問題的關聯。因此我想，這本書裡加入兩篇論美蘇關係的文字，作爲把同一種知識上的方法應用於今日問題的表現，是應有的。

我在此對支持這六個演講的華爾葛林美國制度研究基金會 (Charles R. Walgreen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各位職員，及原發表這兩篇文章的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 編者，謹表我的感謝。

喬治·肯南 (George F. Kennan)

一九五一年六月，紐澤西州，普林斯頓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目次

一、對西班牙的戰爭	一
二、希比斯萊與門戶開放	二〇
三、美國與東方	三六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	五五
五、第二次世界大戰	六六
六、現代世界的外交	九三
★	
蘇維埃行爲的根源	一〇七
★	
★	
美國與未來俄國	一三九
★	
★	
★	
譯者註	一五七

五十年來的美國外交

一、對西班牙的戰爭

我要先略說一說這六個演講的動機。這個動機並不是發乎爲歷史而歷史的抽象興趣。它乃是發乎對於我們今日外交政策上種種問題的深切關注。

半世紀之前，我們美國人對世界環境有一種安全的感覺，我相信那是羅馬帝國時代以來任何民族所未曾有的。而今日那個形態已經幾乎翻轉過來——當前我們民族的意識是被一種不安全的感覺所支配，情形尤甚於西歐許多距我們憂患的主要來源更近，而且地位容易被摧毀得多的民族。然而這種變化大部分也許是，且無疑地是，主觀上的——正好反映我們在一九〇〇年誇大了我們地位的安全，並且對於我們解決問題的力量和才能抱了過高的自信，而今日則又誇大了我們的危險，並且有把自己的才能估計得低於實際的趨向。但事實上這種變化大部分又是有客觀的真實性的；我們一九〇〇年政治和軍事的實際情況誠然是比較上沒有直接的恐懼，而我們今日則面臨着一種情勢，我願坦直地說，在我看來是危險而難解決到極點。

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如此安全的國家怎樣變成了如此不安全的國家？這種變

化有幾分可以說是「我們的過失」？有幾分應歸咎於我們對周圍世界的現實情況沒有看清楚，或沒有重視？

換句話說，最近五十年美國對外關係的歷史究竟有些什麼教訓給予我們一九五一年這一代？我們是這樣被千種艱難和危險所逼迫包圍，而我們周遭的世界則一部分似乎真是志在把我們毀滅，另一部分又對於我們自己，或對其本身，或兼對二者，已盡失了信念。

就是這些問題驅使我在過去幾個月裡重去檢討這五十年間我們國家政策上的若干決定。我當然不能給你們一種希望，說是這些演講可以解答所有這些問題，或者可以把其中任何一個問題解答到無可疑惑的地步。

但是我想，重行回顧這個時期裡國家政策的若干階段，並且試在追溯中從頭設想有什麼可為代替的政策，以及結果又如何，會是一件有用處的事：這是我們能夠希望的。我們很有理由作這樣一件事。不但是因為很多我們現在看得出的事情僅僅在十年之前人們就還看不出；而且我希望我們可以給予這項研究一種新的嚴肅性——這是由我們一生中親見的巨大破壞與犧牲之記憶所引起的嚴肅性，是較之兩次悲慘的世界大戰之前大多數人對待這種問題可能有的更為深思亦更為沈痛的嚴肅性。

我首先要談到的是美西戰爭。

我們今日站在這半世紀的末尾，而非站在它的開端，有些人就看得出我們認為是美國安全所繫的若干基本要素。我們可以看出在我們大部份的歷史上，我們的安全是繫於英國的地位；可以看出加拿大在我們國家與不列顛帝國的優好關係上，特別是一個有用而不可缺的擔保；可以看出英國的地位又繫於歐洲大陸上一種均勢的維持。因此，不使一個大陸上的陸軍國支配整個歐亞陸地，對於我們，和對於英國一樣，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實在利於維持內陸國家間某種安定的均衡，使每一個都不能征服別國，占領大陸的沿海區，變成一個陸上兼海上的強國，擊毀英國的地位，並且——這是這種種情勢下當然會有的——從事對我們有敵意的海外擴張，而得到歐亞兩洲內陸無限資源的支持。看到了這些事情，我們就可以明瞭我們的繁榮和獨立曾繫於歐洲和亞洲的外圍國家：那些眼光朝着外方，跨越着海洋，而不是朝着內面，趨向着陸上征服的國家。

現在我們看出了這些事情，或者自認為看出了這些事情。但這些事情在一八九八年的美國人卻是絕難看出的，因為那些美國人已把一百年以前他們祖先所熟知的事大部分遺忘了。他們已是這樣習於他們的安全，致使他們忘卻了這個安全在我們的大陸以外還有什麼基礎。他們把我們隱庇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之後的安全地位，誤認作美國人有崇高的智慧與美德而避免干涉舊世界卑劣紛爭的結果。他們更注意不到那些注定要在以後半世紀裡破壞那個安全形態